

首都图书馆藏《阙里孔氏诗钞》稿本考略*

王玥琳

摘要 本文以首都图书馆藏清道光稿本《阙里孔氏诗钞》为考察对象,全面介绍稿本《阙里孔氏诗钞》的内容和版本特点,并将其与传世刻本进行对比,从而厘清稿本校改人、校改方式、版本年代、校改特点等具体问题,并揭示稿本的重要文献价值。

关键词 阙里孔氏诗钞;稿本;孔宪彝;孔宪庚;孔宪握

分类号 G256

Abstract Taking the manuscript *Queli Kong Family's Poetry* in Daoguang collected by Capital Library of China as study obje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tent and ed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t, and compares it with hand-down editions, and clarifies the proofreaders, proofreading ways, edition age and proofreading features, and reveals the important literature value of manuscript *Queli Kong Family's Poetry*.

Keywords *Queli Kong Family's Poetry*; Manuscript; Kong Xianshun; Kong Xiangeng; Kong Xianchi

Class Number G256

DOI:10.16384/j.cnki.lwas.2016.02.025

1 引言

《阙里孔氏诗钞》(以下简称《诗钞》)14卷,清孔宪彝纂辑,盛大士选订,是清代曲阜孔氏家族的诗歌总集。

孔宪彝,字叙仲,号绣山,又号韩斋,山东曲阜人,孔子第七十二代传人,清道光五年(1825)举人,官内阁中书,著有《对岳楼诗录》、《韩斋文稿》,编有《阙里孔氏诗钞》、《曲阜诗钞》等。孔宪彝品敦学淳,善诗文,有韩愈遗风,又喜绘画篆刻,写兰最为精妙。游寓京师,居衍圣公邸之东廡,颜其室曰“韩斋”,与魏源、曾国藩、何绍基等名士交往唱和,“文酒过从最盛”,时人称为“韩斋雅集”^[1]。孔宪彝有感于“孔氏诗向无合钞,其有专集行世者,卷帙浩繁,猝难浏览;其有未经镌板者,子孙珍藏手泽,又不轻以示人”,故“汇录各集,乞镇洋盛子履(大士)选订填讳,而宪彝躬事编录之役”,乃成《阙里孔氏诗钞》^[2]。

本文拟在介绍《诗钞》内容、体例、传世版本的基础上,对首都图书馆所藏稿本的内容、特点、其与

刻本《诗钞》关系等方面进行考述,进而厘清稿本校改人、校改方式、版本年代和校改特点等问题。

2 《诗钞》的内容、体例与版本

2.1 《诗钞》的内容与体例

曲阜孔氏为世家大族,诗人辈出,传世作品为数甚多。如何收录和编纂这些诗歌,编者有着明确的去取标准和编纂条例。这主要体现在道光十六年(1836)孔宪彝所编之《凡例》。

《诗钞》之内容,收录了清初至道光间120位孔氏族人(其中男性102人,女性18人)的诗歌作品共计967首。^①收录标准则仿《史通》、《文选》而成。第一,“是集皆采昭代之诗,断自国朝”,只收录创作于清代的诗作^{[2]98}。第二,“是钞或以诗存人,或以人存诗……有全稿行世者,所录亦止数十首,而一二残篇则不暇持择,亟为登入”^{[2]99}。《诗钞》中各诗人名下所录诗歌数量多寡不等,有全集传世者如孔昭虔收诗60首,孔尚任收诗58首,均择其代表作而录;同时仅存录1首者也大有人在。第三,“是钞止载以往,现在作家虽多,概不登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序文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2CZW047)、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拔尖个人项目“中国古代藏书印研究”(项目编号:2014000020044ZS04)研究成果之一。

^①姚金笛博士论文《清代曲阜孔氏家族诗文研究》曾对《诗钞》的作者数量和性别进行统计(山东大学2013年,第38页),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按作者类型分别统计所作诗数,详见下文。

入”^{[2]99}。这一点可由道光二十一年(1841)孔繁灏《阙里孔氏诗钞后序》得以印证:“绣山族祖手编我孔氏诗,断自以往,得百余家,选录如干首,厘为十四卷……今年秋,复出稿本见示,繁灏受而读之,则较前又增数家,而先君遗诗已登入矣”^{[2]98}。第四,辑诗之余,兼附作者小传,列其爵位事迹,“以备知人论世者采览”^{[2]99}。第五,“孔氏分支派别若南渡诸宗及流寓户汇为一编,可至数百卷。是钞由近而推限于闻见,不能遍及广收博采”^{[2]98}。《诗钞》仅收录曲阜地区孔氏族人的诗作,而不涉及其他支系。

《诗钞》之体例,首先,按“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五字孔氏辈次”编次,“不论支派、科第、远近,俱以辈分为先后,惟衍圣公为大宗主鬯,不在此列,故列之卷首,用志敬宗之意”^{[2]98}。故是集卷一、二所收为历代衍圣公诗作(8人,174首),卷三至十二按辈次排列男性族人诗作(94人,673首),卷十三为孔氏女孙诗作(6人,60首),卷十四为孔氏女媳诗作(12人,60首)。其次,“每字辈首名下书‘孔子几十几代孙’,以备考核。自兴字辈以下,则书于大宗名下,后皆从省”^{[2]98}。这一安排是因为集中收录的首位衍圣公即为“兴”字辈,旁支后人的代次可据大宗考察,不必重出。但检视全书发现,这项规定未能彻底执行——卷三、四所收贞、尚、衍三辈中,部分族人就未注明代次。最后,“五经博士例应衍圣公次子世袭,常博、荫生则无定例,故凡袭博士者,不书某公子,常博、荫生则书某公第几子,若世袭知县、执事官,则由拣选授职,不在此例”^{[2]99}。这项规定则有助后人了解孔氏族人在家族谱系中的位置及禄位承袭情况。

2.2 《诗钞》的版本

《诗钞》通行版本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曲阜孔氏刻本,《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有藏^[3]。首都图书馆亦藏有相同版本,但著录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孔氏韩斋刻本,是据道光二十三年(1843)孔宪彝跋文“板成,藏于韩斋”^[4]句而定。2009年,《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以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为底本,将《诗钞》影印出版。今将首

都图书馆藏本与之相较可知,实为同一版本。惟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本卷十四末缺少孔宪彝跋,故以卷前朱锦琮《阙里孔氏诗钞序》所言“道光二十二年余守东郡”^{[2]96}为版本年代依据。

除传世刻本外,《中国古籍总目》中另著录首都图书馆藏有清道光稿本《诗钞》1部(14卷,1函4册,钤“北平孔德学校之章”朱文方印、“首都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索书号(甲四)/855),该书已于2009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9531^[5]。

3 首都图书馆藏稿本《诗钞》考述

3.1 稿本《诗钞》的版式与装帧

稿本以印版乌丝栏稿纸墨笔抄写,半叶10行,每行21字,小字双行字同,黑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半框高18.2cm,宽13.0cm,开本高26.3cm,宽16.9cm,书衣墨笔题签“阙里孔氏诗钞”,版心镌“阙里孔氏诗钞卷第”字样,全书仅阮元序与凡例版心处有页码。卷前盛大士道光十七年(1837)序,仅有板框、书口、鱼尾,无界格,版心亦无题名。

稿本所用竹纸,色黄,薄而有韧性,仅卷前数页稍有老化现象。全书以“诗、书、礼、乐”4字分册,皆为毛装。

3.2 稿本《诗钞》的书写笔迹

稿本呈现多种不同的书写笔迹,略以卷次区分,则序文、卷一的字体最佳,有康乾时期馆阁体意味;余者为普通正楷,十分工整。由此可见,此底本并不是作者的初稿本,而是已经修改后的一个稿本,并且由多个书手抄写而成,最初的编辑加工痕迹已不可见。校改笔迹同样复杂多变,至少有2—3人参与其中。

3.3 稿本《诗钞》的结构与内容

稿本由序文、凡例、目录、正文和校改5部分构成,除阮元、孔庆镕二序未加删削外,底本大部分内容都存在校改痕迹。

(1)序文。卷前序文共3篇,按位置先后依次为:

首道光十九年(1839)阮元序。^①阮元继室孔璐华为孔子七十三代女孙,赠衍圣公孔宪增之女,

① 序文末记“扬州阮元书于京邸节性斋,时年七十有五”,其撰写时间据此推定。

因而阮元也自称为“七十三代门婿”，由他撰写孔氏诗钞序文实属当仁不让。

次道光十七年(1837)盛大士序。盛大士，字子履，号逸云，别号兰穆外史、兰畦道人，镇洋(今江苏太仓)人，清嘉庆五年(1800)举人，官山阳教谕，“精绘事，用笔似董思翁……文法唐贤，诗兼各派”^[6]，有《蕴悱阁诗集》、《朴学斋笔记》等传世。从序文内容可知，盛大士与孔宪彝父子两代 4 人的关系都十分密切，相交数十年间唱和不断。也正因此，盛氏受邀膺任《诗钞》纂辑者之一。细审此序之纸张、版式、笔迹、墨色，与稿本其他部分差异明显，落款“盛大士子履”等字笔迹则与传世盛氏落款极为吻合，序末还钤有“大士”朱文、“兰道人”白文二小方印，因此基本可以断定是盛大士之手书。但是该序在内容上主要围绕孔宪彝之弟宪庚展开，叙宪庚诗学修养以及盛氏与其亲密交往，并未论述《诗钞》一书的纂辑与刊刻，与传统书序写法相违，令人感到困惑。事实上，这是盛氏为孔宪庚某诗集所撰序文，与《诗钞》全无关系，其性质以及出现于此稿本中的缘故，后文还将再叙。

末道光十六年(1836)孔庆镕序。孔庆镕(1787—1841)，字陶甫，号冶山，孔子七十三代孙，乾隆五十九年(1794)袭封衍圣公，有《铁山园诗集》8 卷。作为时任衍圣公，孔庆镕对《诗钞》的纂修十分重视，不但亲自撰写序文，“且亟劝其付梓以寿世”。

(2) 凡例。凡例共计 10 条，大体分为 3 个方面的内容：第 1、10 条介绍《诗钞》纂辑缘起、编者情况，以及为此书做出贡献的孔氏族人；第 2、6、7、8、9 条说明内容去取原则；第 3、4、5 条则用以规范书籍编纂体例。尾署“孔子七十二代孙宪彝叙仲敬识”，说明此凡例为孔宪彝制定。

(3) 目录。目录端题“阙里孔氏诗钞目次”，共分 14 卷，可见此书的体量与结构在当时业已成型。

(4) 正文。《诗钞》正文卷端首行为题名“阙里孔氏诗钞卷第×”，顶格书写；次两行为编者，题“镇洋盛大士选订/曲阜孔宪彝纂辑”；再次为诗人姓名，以单行大字书写，低一格，姓名下为小传，双行小字，折行处亦低姓名一格；再次为诗题，单行大字，低二格；最后是诗文，单行大字，顶格书写。

全书对于用讳和敬称十分严谨。如遇“孔

子”、“国朝”、“君王”、“宸翰”、“乾清宫”一类词汇，一律空一格敬书；清代皇帝名讳一概以缺笔的方式加以避讳。

《诗钞》卷十四末页下方，写有“曲阜刘文炳镌”字样，可见在此稿本抄写时，已基本确定了下一步刊刻工作的匠人。

3.4 稿本《诗钞》的校改

校改者以圈改、涂抹、眉批、浮签等方式，对底本格式、内容进行了大量的校改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整体例。《诗钞》底本在抄录时已遵循一定原则，此次校改者又对格式、用字、称谓等进行了重新调整。①目次中原题“卷×”统一改为“卷第×”，与版心和正文卷端保持一致。②卷端著者原距下边栏 4 字，校改者将其下移两格，题浮签为“下空二格”。③在涉及皇室和孔氏祖先时，称谓前空一格以示尊敬，原有个别采用折行顶格书写的地方也统一改为空一格接写。如孔庆镕序“……暨我列公诸诗。窃叹/圣泽相承，永永无已……”之句，天头处批写识语“‘圣泽’空一格，接写”。

第二，校订和修改内容。①对个别文字的增删、校改和考证。如“霭，当作‘霭’，查字典无‘霭’字”，“盲，系目盲字，音氓，‘膏肓’系‘育’字，音荒”等，此类修改大多以浮签形式出现。又如卷二孔继澐《九日鲁南城登高用壁间杜韵》，改诗题为《九日鲁南城登高用壁间杜诗韵》，增一“诗”字；卷十三孔丽贞《中秋玩月》“寂寂寒蛩已报秋”之句，改“寂寂”为“唧唧”。可见校改者对抄录过程中出现的错、衍、漏字进行了详细校改。②对整体行文的修改。如将孔庆镕序中“然皆合一代之著述，成一代之大观，未有以一姓文章辑为钜册，传诸艺林者也”，改为“宣城梅氏《诗略》则合一姓编为家集，然始唐讫明，仅数百人，以千余年之菁英，始成简策，未有以一代文章辑为钜册，传诸艺林者也”。③整篇增入或删除。如卷二孔昭焕条下原本仅录《乾隆戊辰驾幸阙里恭和赐诗元韵》等 3 首应制之作，校改者复以浮签形式增入《送燕》、《雪门杂咏》等 4 诗，使后人得以了解诗人遣情小品的一面。又如同卷孔庆镕条下原有《芙蓉曲》360 余字长诗一首，不知何故被整篇勾去，天头处也题有“删去不写”的批语。这些被删去的诗作有可能已

成为佚诗。④对称谓的修改，历代衍圣公统一以“某某代祖”称之，其余各人以字号或官职称。如卷一孔兴燮条小传原为“公少孤”，改为“先六世祖少孤”。又如卷四孔衍劭条原为“懋诣少好学”，改为“懋诣司马少好学”。

第三，调整篇章顺序。《诗钞》按孔氏辈分排序，百余人中难免有年齿相近而致顺序错乱者，校改者对此逐一纠正。如正文卷四顺序原为孔衍棧、孔衍棻、孔衍劭，校改者在孔衍棧处贴浮签，题“衍棧诗列入衍棻之后、衍劭之前”。目录中也存在此类校改，主要是增加了孔庆镛、孔传斌等 10 人的名字，并按照一定顺序以单行小字补写入原文空隙处；其中孔昭熏在第一次补写时位置有误，被校改者删掉，又重写在正确的位置。

4 稿本《诗钞》与刻本的关系

稿本《诗钞》保存有大量修改痕迹，其作为修改稿本的性质毋庸置疑。将稿本与传世刻本进行对比，二者之间的异同之处亦鲜明可见。笔者即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略作分析。

4.1 版式上的比较

如前所述，稿本是抄写在刻印成型的《诗钞》专用稿纸上的，经对比可知，稿本的版式、行款与传世刻本几近一致，惟板框高度略大于刻本，版心题名字体稍有不同。由此可知，《诗钞》的版式行款在抄录此稿本时已经谋定，但它还不是最终付梓时的版式，正式刻印前，编者又进行了微调。稿本的抄写字体以工笔小楷为主，但是各书手之间笔迹差异明显；而刻本一律使用具有清中晚期刻版风格的宋体字，字体方正，版面较为紧凑，没有明显的字体差异。可见在定稿后，编者又重新延聘书手写样上板，用于雕印。

4.2 内容上的异同

稿本的底本、校改和刻本形成了《诗钞》的 3 个不同文本，对其内容进行比较，可以厘清不同文本间的关系，帮助我们了解《诗钞》的成书过程。

(1) 序跋文。《诗钞》稿、刻本的序跋文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诗钞》稿本与刻本序跋文比较

顺序	序跋文		说明
	稿本	刻本	
1	道光十九年阮元序	道光十九年阮元序	内容相同，无校改
2	——	道光二十二年朱锦璋序	刻本增序
3	道光十七年盛大士序	盛大士序	完全不同的两篇序文
4	道光十六年孔庆镛序	道光十六年孔庆镛序	稿本经校改与刻本相同
5	——	道光二十一年孔繁灏后序	刻本增序
6	——	道光二十三年孔宪彝跋	刻本增序

刻本较稿本增出的 3 篇序跋文，均撰写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之后。是年孔庆镛去世，孔繁灏接任第七十四代衍圣公，并且在序文中提到了《诗钞》将其父诗作收入的情况。书末孔宪彝的跋文是确定刻本年代的重要佐证，文中概述了《阙里孔氏诗钞》和《曲阜诗钞》的成书年代、刊刻助资人姓名、监刻校订者姓名、藏版地等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编者在稿本中对孔庆镛序进行了版式和内容方面的校改，这些调整最终都保留在了刻本之中。最为特殊的当属盛大士序，因为在刻本和稿本中是两篇完全不同的文章。作为编修者之一，盛氏熟知《诗钞》成书情况，其序文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刻本盛序介绍了《诗钞》的纂辑意义、孔宪彝之贡献、盛氏与孔氏父子的渊源等内容，切中肯綮，是盛氏为《诗钞》所作书序无疑。稿本盛序的创作缘起则是盛氏所言“余故序经之诗而即以相慰，且以相勗”，与《诗钞》全然无关。孔宪庚，字叔和，号经之，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孔宪彝之胞弟，有《十三经阁诗集》、《疏华馆纪念诗》、《至圣林庙碑目》、《经之文钞》等著述传世。^① 笔者认为，稿本盛序极有可能是为《十三经阁诗集》、《疏华馆纪

① 据丁锡田辑《习庵丛刊·二孔先生传略》(民国二十五年丁氏排印本)与刘逸生《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286 首“孔经阁”条注(页 345)。

念诗》二诗集之一而作。^①由此推断,稿本盛序是在稿本《诗钞》的抄写至校订过程中误入的(误入者可能就是保存有盛序手书的孔宪庚),在最终付梓前被撤换为刻本盛序。

(2)凡例。稿本与刻本《诗钞》的凡例同为10条。底本、校改和刻本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①凡例第10条从稿本底本至刻本,不断添加编纂校对

的孔氏族人之名(如表2所示),可见陆续有孔氏族人参与到《诗钞》编纂工作中来。^②凡例落款,稿本为“孔子七十二代孙宪彝叙仲敬识”,校改者并未做出修改,但刻本却变为“道光十六年春孔子七十二代孙宪彝谨书”。由此足以证明,此稿本绝非是最终定稿,其与刻本之间显然还存在着更进一步的修改稿本。

表2 《凡例》第10条增减情况

版本	凡例第10条	说明
稿本底本	是钞征求校录三载,始克成书。彝实谄陋,皆籍力于戚友,伯叔兄弟而同事商榷考证,则尤以从祖广权、从叔昭薰、从兄宪琮、宪璜、伯兄宪阶、从弟宪恭、季弟宪庚、从侄庆鋈为多,故既详列于简而并识之云。	下划直线者系稿本校改文字 下划折线者系刻本增加文字
校改	是钞征求校录三载,始克成书。实愧谄陋,皆籍力于戚友,伯叔兄弟而同事商榷考证,则尤以从祖广权、从叔昭任、昭薰、昭煜、从兄宪琮、宪璜、伯兄宪阶、从弟宪恭、季弟宪庚、从侄庆銓、庆鋈为多,故既详列于简而并识之云。	
刻本	是钞征求校录三载,始克成书。实愧谄陋,皆籍力于戚友,伯叔兄弟而同事商榷考证,则尤以从祖广权、从叔昭任、昭薰、昭煜、从兄宪燮、宪琮、宪璜、宪绅、伯兄宪阶、从弟宪恭、宪逵、季弟宪庚、从侄庆銓、庆鋈为多,故既详列于简而并识之云。	

(3)目录。稿本中对目录的校改之处与刻本最终面貌是一致的;但刻本卷八在孔广林和孔广森之间又增加了孔广秀的名字,这在稿本校改中没有体现。细审稿本,其实孔广秀的诗作已在正文中增加,只是目录中的遗漏未及时校改。

(4)正文。《诗钞》稿本对正文的修改全部延用在刻本中,包括对版式、称谓的调整,诗文内容的校改,选录诗歌的篇幅调整等。但同时,刻本还更正了一些稿本中没有校改的问题。如稿本卷四

孔衍棻小传作:“字懋法,号石村,贡生……石林学博,为东塘农部从子……”,此处孔衍棻的号前后不一,显然是出现了错字,“石林”当为“石村”之误,但稿本并未校出,直到刻本才被改正。

此外,稿本与刻本还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正文与目录不一致,有编排顺序的差异,也有姓名用字的不同,这些问题在稿本中就已存在,但刻本中仍旧未改。通过表3,可以清楚地看出目录与正文的差异:

表3 目录与正文差异对比

卷次	目录内容及顺序	正文内容及顺序
卷五	孔传中—孔传商—孔传斌	孔传斌—孔传中—孔传商
卷五至卷六	孔传炯(以上卷五)—孔传钺—孔传相—孔传经—孔传溥(以上卷六)	孔传炯—孔传相—孔传经(以上卷五)—孔传钺—孔传溥(以上卷六)
卷七	孔继香—孔继袞—孔继澥	孔继袞—孔继澥—孔继香
卷十四	王墨庄	王氏
卷十四	汪氏	汪之蕙

以上通过对《诗钞》3个文本的比较分析可知,它们之间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从稿本到校

改再到刻本的延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这部稿本已是距刻本非常近的一个版本。但稿本与最终

^① 经笔者检索,《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国家图书馆藏有清道光十七年刻本《十三经阁诗录》一部(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集5,页2375),其版刻时间与稿本盛序相吻合,序文从属此集的可能性较大。然在目前国图电子数据中未检索到该书,俟后继续查找。笔者也将另撰文进一步考证稿本盛序的相关问题。

刻本诸多细节之处的差别,又证明了在二者之间还存在中间版本,此稿本并不是校改的终结。

5 关于稿本几个问题的探讨

5.1 稿本所有者、校改人和校改方式的推测

如前所述,凡例中提及参与《诗钞》校改的孔氏族人甚多,且从稿本底本至刻本,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同时,稿本中明显包含两种以上的校改字体,说明参与这个底本加工的非止一人。

笔者检视发现,稿本卷五和卷九各夹有信笺一件。前者以半张荣和斋制梅花纹竹节栏信笺纸墨笔书写,6行,笺高24.6cm,宽6.9cm;后者以红纸墨笔书写,亦为6行,纸高16.0cm,宽7.8cm。这两件信笺的发现,对于判定稿本所有者和校改人的身份十分重要,兹逐录如下:

《诗钞》稿本卷五附笺:

诗钞四本送去,乞照收。翻阅一过,尚不知有错讹否,望法眼再勘校。内传檀、(传)松皆字振茂,必有一误,渠系嫡堂兄弟,万不致重字也。日内有柬□便否,如有时希示一信,以便□绣山写字,此候。

经之六弟元祉。

枫溪便纸。

《诗钞》稿本卷九附笺:

经之六弟元祉。

宪墀顿首启。送去诗钞二本,乞照收。内有未看出之处,希再细心一较,再钞中改写。“嘑”字皆如此写,或改与否,尊意裁之可也,仆亦未签出。此候。

信笺所及二人,“经之”即前所述孔宪庚;“枫溪”是孔宪墀之字,清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孔宪彝之堂兄。

信笺内容显示,孔宪墀先后两次将自己校改过的《诗钞》稿本送交孔宪庚再校,并随信提出阙疑之处请其斟酌取舍。由此推断,此稿本4册或即为卷五信笺所言“诗钞四本”,由孔宪墀初校,通过浮签的形式提出了不少有待确认的问题,而后再交由孔宪庚复校。因此浮签中存在不少两种笔迹、一问一答式的校改意见,且答语多言之有据,

若仍无法确认,则付之阙如。如卷十中一浮签题“‘嘑’,疑作‘涕’。作‘涕’则重上句,然‘嘑’字似未妥”^①。

通过对两封信笺和书中浮签的分析可以看出,宪墀、宪庚兄弟在《诗钞》校勘一事上出力颇多且非常谨慎,可谓字斟句酌。但细审稿本凡例发现,在底本列举的孔氏族人参与者中竟未提及宪墀,校改之后仍然没有,直到刻本中才将其列入。由此可以推测:第一,此稿本的最初所有者应是孔宪墀;第二,宪墀、宪庚都是校改者。宪墀在底本上进行初校,而后转交宪庚复校。这个过程可能发生了不止一次,有时是4册一起转交,有时仅转交两册;第三,《诗钞》的校改有可能是几个底本同时进行的,相同或不同的底本掌握在多个族人手中分别校改和复校,最后再由一人(有可能是孔宪彝)统稿而成。这也能解释为何首都图书馆稿本中未改的错讹在刻本中被修改了,很可能是其他校改人发现的问题;第四,众多校改人加入此项工作的时间有早晚之别,因此凡例出现了一再添加姓名的情况。孔宪墀加入的时间可能较晚,在稿本底本形成之后才加入,因此直到刻本中才出现其姓名。

5.2 稿本版本时间的推断

目前稿本版本仅著录为“清道光稿本”,但通过对稿本内容修改情况和《诗钞》成书过程的分析,是能够进一步推断其时间的。

首先,稿本卷三中收录了第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的23首诗作。根据《诗钞》不收录存者的标准,只有到孔庆镕去世后,其作品方能入选。虽然底本的目录还没有增入孔庆镕,但其正文已增入,这足以说明稿本底本的抄写年代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之后。

其次,刻本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跋》曰:

《阙里孔氏诗钞》十四卷成于丙申,《曲阜诗钞》八卷成于辛丑。癸卯春,叔父自临榆分寄俸金,始获开雕。工力不继,宗子伯海上公出资相助,镇洋沈鹤坪丈人宗约复为之筹画,遂举以付劂鬲氏。同事监刻校订则郑子斌表兄宪铨、从兄宪墀、季弟宪庚实力任之。板成,藏于韩斋。道光二

① 下划直线为孔宪墀所书,下划折线为孔宪庚所书。

十三年癸卯秋八月。孔宪彝识^[7]。

这篇跋文详细记述了《诗钞》的成书和刊刻过程,可见《诗钞》初成于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二十三年癸卯(1842)春始进行刊刻事宜,至秋八月刊成。因此稿本成书时代最晚不会超过道光二十三年(1843)之初。

综合上述情况,首都图书馆藏《诗钞》稿本的成书年代应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二十三年(1842)年初之间。

5.3 稿本的校改特点

5.3.1 校改周期较长

据孔宪彝跋所言,《诗钞》初稿成于道光十六年,至稿本出现的道光二十一、二十二年间,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参与文稿编校的孔氏族人可能一直在进行各种校改工作,其所投入的精力是相当可观的。可以想见,在此稿本之前的数年间,必然还存在过许多不同阶段的编辑稿本,孔氏通过数次校改才逐渐形成了最终的定本。

5.3.2 校改详细而严谨

虽然距《诗钞》付梓仅1年左右,但此稿本的校改仍然非常详细,从篇章调整到斟酌用字,从版式位置到称谓用语,可谓面面俱到。在详细的同时,校改者还保持了严谨慎重的态度。稿本有些地方,校改者曾对底本进行两次修改,首次修改勾去原文,并在其旁边添写新文,而第二次修改又圈去了校改的文字,改用黏贴浮签的方式再次补上替换的文字,足见校改者曾反复审阅稿本。此外,大多数校改有考证、有阙疑。从稿本保留至今的浮签可以看出,校改者运用了多种工作方法,如查字典以定字形、据史传考诗人生平、察学术前史修订序文观点、将前后文对校以确定用字、从音韵学角度分析用字等,可以说每一处改动都基于充分的论据,使人信服。而对于一时无处可查或模棱两可的问题,校改者予以阙疑,指出问题而不盲目修改,更体现了其严谨的态度。

5.3.3 校改成于众手

如前所述,稿本的校改至少经过了孔宪樾、孔宪庚两人之手,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了此本的校

改尚未可知。但从中可以推测,《诗钞》一书可能采取的正是一种多头并进、反复审校的工作模式,多位校改人在同一个底本上轮番校改,多个修改稿本同时校改并在最后由专人统稿。这样多人同时开展工作,既有效地节省了校改时间,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谬误。

5.3.4 校改尚存疏漏

虽然编校者们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耐心,但从最后的刻本情况来看,仍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如目录与正文顺序不统一、目录姓名与正文姓名不一致等,这些问题其实在稿本中原本已经存在,但在付梓时仍未得到修改,由此也留下了些许遗憾。

6 结语

综上所述,首都图书馆藏《阙里孔氏诗钞》稿本是《阙里孔氏诗钞》的一个重要版本,特别是在其他《诗钞》稿本皆未能传世的情况下,稿本《诗钞》就成了后人考察该书编纂刊刻情况时不可忽视的一部文献。同时,稿本《诗钞》在版本、稿刻本的关系、校改等层面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与特点,也为我们认识清代家族诗文集的编纂、校改、刊刻流程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值得探究的样例。

参考文献:

- [1](清)王 拯. 韩斋雅集图记[M]// (清)王 拯. 龙壁山房文集. 清光绪七年(1881)陈宝箴刻本.
- [2](清)孔宪彝. 阙里孔氏诗钞[M]// 韩寓群. 山东文献集成: 第三辑: 第41册.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 [3]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 中国古籍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3111.
- [4](清)孔宪彝. 阙里孔氏诗钞[M]. 清道光稿本.
- [5]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242.
- [6](清)刘 瓌. 国朝画徵录补录[M].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 222.
- [7](清)孔宪彝. 阙里孔氏诗钞[M].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孔氏韩斋刻本.

作者简介:

王玥琳(1980—),女,副研究馆员,首都图书馆,北京,100021.